

# 我和圆明园路一百四十九号

张熙棠

集会，听马寅初先生激昂慷慨的报告。文汇报、记者，参加革命……就这在我脑海里扎下了根。及至1949年5月3日杭州刚解放，我就寻到杭州玉泉解放军驻地，要求参军，解放军热情接待，立即推荐我报名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联合组建的华东军政干部学校，即后来的华东军政大学。报名投考后，我被录取了。可是这时，杭州新闻学校又招生了，我一打听听说就是解放军培养记者办报纸的学校，就又到去投考，又考取了。我毫不考虑地放弃了军政大学，进入新闻学校，就这么成为一个军事记者。1954年部队叫我转业，我仍想干记者这一行。正好我在部队的老上级已在上海工作，我就找到他，当时他是上海市委宣传部长，他问我，上海报纸很多，你想去哪家报社？我毫不犹豫地回答：我要到文汇报去！他说文汇报马上就要变成教师报了，你去吗？我说：去文汇报！我就是这么到的文汇报。

文汇报那时还是私营性质，在我来之前，干部人员都是通过招聘进来的，所以我既是第一个分配来的，也是第一个转业军人。就这样，我穿着摘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胸章的军装，进了文汇报。

接待我的文汇报副社长严宝礼先生对我说，我们报社穷，给你的工资是135个折实单位打七折支付，每月73元，分两期支付。我一下子拿到了三十五元，高兴得就想跳起来，因为我在部队里每月拿到的津贴是一斤猪肉四两黄烟的钱，只够在上海买一只口得意牌牙膏、一条肥皂。所以就在报到的当天，我直奔南京路四川路口的惠罗公司，给我父亲买了一件卫生衫，花了六元人民币，算是我出生后第一次对我父亲所尽的一份孝心！

从此以后，我在这个圆明园路149号的大门进进出出，整整待了四十年，直到1994年在文汇报正式离休！当然，这之后，还有五年，又让我参与主编《上海新闻志》，仍然常常在报社进进出出。这就是我同圆明园路结下的缘。

圆明园路还是这条圆明园路，149号，依然是我多么熟悉的149号。然而，当我们三人正想迈步跨向台阶时，被人挡住了，说现在是一个公司的办公室了，不让随意观看。

我们三个人只好退到马路上，抬头看看大楼，依恋地默默看着哪个窗子里面是自己的办公室，哪个窗子边曾经是我们的老总编辑徐铸成先生、陈虞孙先生、马达先生的办公室。那靠近路边两层楼的四扇窗子，那是我们常常聚会的地方吗？！五十年代，徐凤吾、孙望全……他们结婚就在这里，我们还看新郎新娘跳“采茶扑蝶”舞呢！多热闹。

我们退到马路中央，以149号为背景，请一位过路的行人给我们拍了一个合影，总算不虚此行吧。

喝咖啡呢？原来是人家传言错误，咖啡室是在149号旁边一幢房子里，既来之岂能白跑，此行的倡议者水涓亭请客，我们三人各喝了一杯咖啡。

2018年12月4日

有人说：你们《文汇报》的原办公大楼现在设了咖啡厅。

每天早晨必与我微信联系的水涓亭对我说：去咖啡厅看看怎样？这主意不错，立即决定，同时约了肖寅，三个老文汇报重返圆明园路149号。

这天是2018年11月23日，正巧落雨之后，天气晴朗。水涓亭为照顾我，要“打的”送我去。我坚持——这圆明园路呵，有着我老头多多少少的情思啊！我岂能坐个出租车同一个不相干的人一起，一阵风似的就踏进她？我得像当年那样，挤上公交车到外滩下车，然后一步一步地从北京东路转弯，对了，那转角的大楼还是当年我未婚妻办公的地方，对面就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在这里，经常可以碰到电台的记者进进出出。再往前走，就是圆明园路了。

来自浙江诸暨农村，从小在西施浣纱的江边长大，我就读的小学就叫浣滨小学。一个农民家的孩子，尽管也算中国历史上著名美人西施的家乡，怎么能够来到大上海这赫赫有名的圆明园路呢？这就是因为圆明园路上的文汇报！

1946年抗战胜利以后，我从当时在浙西的山区后方第三临时中学转到杭州。在杭州读书时，上海发生了“反饥饿、反内战”，“反对出卖内河航运权”的学生运动，我们杭州也举行了大中学校联合大罢课的游行示威，我一腔热血也参加了。我记得，我清楚地记得——手举文汇报，高呼口号，参加游行示威，并且来到杭州市的民众教育馆

永乐大帝朱棣有一名朝鲜妃子权氏，当初在贡女中就格外突出，“色白而质细粹”，朱棣就问她道：“你有什么才艺呢？”权氏于是取出玉箫吹奏起来，乐声清远悠扬，朱棣大悦，之后对她非常宠爱，“逾月，册贤妃”。朱棣的弟弟小十七朱权，是明初著名的诗人。他曾在一首首词里写道：“忽闻天外玉箫声，花下听来独自。三十六宫秋一色，不知何处月偏明。”这还用问么？君恩所在，必然是权妃那里月色格外怡人了。上有所好，下必趋之。权妃善箫，在宫中带起了一阵学习乐器的热潮，于是朱权又写道：“‘觥’鱼窗冷夜迢迢，海峤云飞月色遥。宫漏已沉参倒影，美人犹自学吹箫。”夜已深沉，倒影参差，而寂寞地守着冷窗的美人，还在执着地学着箫曲。

朱权的宫词写得很清丽，如果你用百度去搜，出来的第一句便是“觥鱼窗冷夜迢迢”，然后你就会很困惑，因为这个“觥鱼窗”的品位实在是太奇怪了。我当时就是莫名被这句戳中了笑点，脑洞补了很多克鲁苏和触手系之后，才收住了诡异的微笑，老老实实去查讹误了的原文到底是什么。原来是个“觥”字。

觥，就是鱼脑骨，再具体一点，是鱼枕骨。因为“觥”字比较冷僻，所以常常被“枕”字代替。那么觥窗，就是用鱼脑骨装饰的窗子了。

一提到鱼脑骨，我条件反射地想起了黄花鱼。黄花鱼是石首鱼科，头上有两块矢耳石，吃鱼头的时候就能看到：小点儿的有米粒大小，大点儿的能有指甲盖大，颜色莹白，质地有点儿像碎碟。

那觥窗是不是就是用黄花鱼的鱼脑石做装饰的窗子呢？宋彭乘《续墨客挥犀·鱼觥》云：“南海鱼有石首者，盖鱼觥也。取其石，治以为器，可载饮食。如遇温毒，器必爆裂，其效甚著。福唐人制为尤精，明莹如琥珀。人但知爱玩其色，而鲜能识其用。”

这条似是证明了我的猜想，很明确地说是石首鱼无疑了。福唐就是今天的泉州福清。福建人靠海吃海，多得黄花鱼取其脑石做装饰好像也说得通。所以在很长时间里，我便认为，所谓觥窗，应该就是黄花鱼鱼脑石，打磨之后像螺钿一样镶嵌在窗框上，作为家居的装饰。

然后我就陷入了思索：这到底有什么好看的呢？

# 想象中的“‘觥’鱼窗”

周帆

鱼脑石虽然也勉强可以算莹润，但那么小，一粒一粒嵌窗棂，为什么不用大米？！而且说它“明莹如琥珀”也实在不太像，勉强也就“明莹如大米”吧。

既然我第一次看到“觥窗”是出现在诗词里，我决定继续向诗词中寻找它的信息。

“觥窗”算是个僻词，存诗并不算多，张先的《玉树后庭花》中写道：宝床香重春眠觉。觥窗难晓。新声丽色千人，歌后庭清妙。青骢一骑来飞鸟。靓妆难好。至今落日寒塘，照台城秋草。

又，元代袁柳作《七律·马伯庸拟李商隐无题次韵四首其一》诗联：

金缕歌残月堕江，玉颜曾忆侍油幢。象床云重思专查，锦锦波翻叠叠双。春浅正宜毡作幕，夜深凉恨就为窗。洗纱可是无灵匹，侧足寒溪漾石凉。

又，明代沈周题《仕女图》画：

纤薄虚日映楼，杏花风荡玉帘钩。手攀妆奁偷微笑，红脚蛛丝在上头。

又，明《剪灯新话》中《渭塘奇遇记》写王生遇酒肆少女，梦中与之欢会，赋会真诗三十韵，中有“窗薄涵鱼觥，炉深喷麝煤”句。

然后就是清末词人樊增祥，他诗风浓艳，特别爱写“觥窗”，其中有三首长调，截取如下：

尽潇潇。画檐鸣玉，无眠又过今宵。早鹤催残夜，觥窗深掩红罗，夜香委晓。《八六子》

了无暑。南来几、梅风吹霁虹雨。博山烟一缕。轻度觥窗，索带芳树。罗衣楚楚。添半臂、泥金刚毅。玉簪龙麝似水，伏六曲画屏风，把新寒防护。《角招》

园梅都拆，驻芳晖几。掩映修篁外，徘徊白。疏香暗度帘隙，好殷勤赠与，绿华条脱。当华处、觥窗明密，无奈是，十日春寒琐梦，损颜色。团扇月、又照灯夕。看近来、蓟北江南岸，花交玉接。《六丑》

可见从宋到清，觥窗一直在被人使用。明萧洵在《元故宫遗录》中还提到过元代宫殿的一处布置：“又有花亭毡（一作球）阁，环以绿墙碧瓦，绿障觥窗，左右分布异卉幽芳，参差映带。而玉床宝座时时如（此处阙字）流香，如见扇影，如闻歌声，出户外而若度云宵，又何异人间天上也？”元明两朝，皆以觥窗装饰官殿，那它应该是极华丽的，是雕栏玉砌的同类，靡丽华贵的象征，才配做玉容深锁的伴侣，奇情艳遇的背景。

此外还有“觥灯”。这种精美灯具曾出现在《武林旧事·灯品》和《明史·仪卫志》里。我的审美告诉我，鱼觥的颜值如果只是黄花鱼鱼脑石的程度，并不值得人们一再书写。

而且我在检索的时候还发现了一个更厉害的。元代孔齐写的《至正直记》第二卷中记录道：

前辈以鱼觥作筒牌，方广八寸，状如旧家红漆木筒板，盖惜字省纸，又便于临摹古法帖。

说黄花鱼长到一人长我相信的，但是剖个鱼脑石出来能“方广八寸”就太夸张了，还能往上临帖，至少这个鱼觥筒牌不可能是黄花鱼鱼脑石了。

那么，它到底是什么呢？

明代王佐有《新增格古要论》十三卷，其中记载了这么一条：“鹤顶，出南蕃大海中。有鱼顶中觥红如血，名曰觥鱼。”同为明代人的张璠《东西洋考》里也采用这个说法。“鹤顶”能做梳子、装饰腰带，它有可能是觥窗的本体么？

那觥鱼又是什么？百度百科像模像样地给了一个英文名“merluccio”，去查一下就会发现“欧洲无须鲑”——这

也差太远了。众所周知的鹤鱼倒不是没有，正好我前两天看《海错图笔记2》里博物君科普鲷鱼，可是鲷鱼脑袋小得只有拇指大小，你还会得剖它取鱼觥么？！“觥红如血”的到底是什么，直到马欢在《瀛涯胜览》才破了案：“鹤顶鸟大于鸭，毛黑脰长，脑骨厚寸余，内黄外红，俱鲜丽可爱。——眼熟不？对！那是盔犀鸟。古人老觉得鸟往大水里一扎猛子就变成鱼，这可真讨厌。（以上资料来自周运中先生的《鹤顶红、西洋布及其他——（新增格古要论）与明初中外交流》。）

好在“鱼觥”两字虽冷了点，“鱼枕”两字就好多了，尤其是我们最爱的苏东坡先生，写过这样一篇：

莹净鱼枕冠，细观初何物。形气偶相值，忽然而为鱼。不幸遭网罟，剖鱼而得枕。方其得枕时，是枕非复鱼。汤火就模范，魄然冠五岳。方其为冠时，是冠非复枕。成坏无穷已，究竟亦非冠。假使未变坏，送与无发人。簪导无所施，是名为何物。我观此幻身，已作露电观。而况身外物，露电亦无有。佛子慈因故，愿爱我此冠。若见冠非冠，即知我非我。五浊烦恼中，清静常欢喜。

这就是著名的《鱼枕冠颂》，行书保存至今。其实宋明时鱼枕冠很常见，《东京梦华录》和《梦粱录》里都提到过市集上多有鱼枕冠售卖、修补。

《水滸传》和《醒世恒言》里，也都描写过年轻女孩子头戴戴着它的模样。《鱼枕冠颂》后半段是偈子，不是我擅长和喜欢读的，但是前面半段提供了相当大的信息量，特别是“汤火就模范”一句，揣度起来，似是说要先加热融化再铸形？如果是这样，那做这种鱼觥也绝对不是黄花鱼鱼脑石了，鱼脑石本质是碳酸钙，肯定是不能融化的。

这个时候我发现了一种很小众的文玩：青鱼石。

百度说：青鱼石又称黑鲛石、鱼惊石、鱼精石、鱼枕石，为青鱼枕骨下方咽喉部一用来辅助压碎螺蛳等硬质食物的角质增生。其色黄嫩，其形如心，干透后坚硬如石，晶莹剔透，如翠似玉，在客家人地区奉为珍稀物品。

我看完一拍大腿：这个好！不仅我吃过，见过，而且和现有信息一一对应上！

首先，《尔雅·释鱼》曰：“鱼枕谓之丁。”郭璞注：“枕在鱼头骨中，形似篆书‘丁’字，可作印。”大家下次吃青鱼的时候可以扒开鱼头找一下，那块淡黄色角质骨的形状，像一个工兵铲头，和大篆的“丁”字一模一样。

第二，青鱼石客家人盘得比较多，也符合“福唐人制作尤精”的描述。

第三，青鱼产量多，也容易长得很大。据说一条40斤的青鱼，这块青鱼石可以长到5厘米以上，这相当可观了。元明宫殿都在内陆，河鱼比海鱼方便易得，取青鱼石做装饰更合理。

最重要的一点：青鱼石打磨过后，颜色非常缠绵水润，介于娇嫩的粉红和鹅黄之间，或形容为珊瑚粉，接近透明，说它“明莹如琥珀”一点也不夸张，可以代替玻璃镶嵌。而且，它是角质蛋白，可以受热融化。

虽然并没有见过青鱼石被加热融化后重铸的产物，但是有羊角、玳瑁制品的例子在前，而且古代工艺厉害得很，比如故宫馆藏的象牙席——连又脆又硬的象牙，都有办法“用法煮软，牙齿逐条抽出之柔软如线”，使之可以随意卷起，融化青鱼石大约是可以一试的？

如是，则无论是鱼觥冠，还是可载饮食的杯碗、鱼觥筒板，还是能透光亮的觥灯、觥窗，做法就都能想象得出了：将青鱼石收集起来，以法使之融化，然后灌注到模具里，等它冷却成型。

它色泽柔和，透光度好，价格便宜，装饰性强。毫无疑问，觥在这里就是做了玻璃的替代品，而且比透明玻璃颜色更丰富，更适宜装点闺阁。

但觥也有致命的弱点，它怕水，怕干，怕污，硬度低，易霉易裂，也是蛮不耐用的。如果要用这种“玻璃”去嵌窗子，需要经常更换。虽然绿绮觥窗，美人箫是个无比美丽的画面，估计也很难抵挡风吹雨打，虫蛀蠹蚀。尤其在玻璃普及之后，鱼觥被取代是必然的事情了！无论是鱼枕冠、觥灯还是觥窗，都还没有实物出土，才会让我们今天对曾经流行过的物件，感到无比陌生。

# 笔会

正月

(雕塑)

周阿成



# 过境，“可疑”的访客

陈晓兰

此复杂的政治和文化隐喻。19世纪的移民浪潮和欧美列强之间的剧烈竞争，一次大战及战后动荡的局势，使西方列强对于跨国位移实行严格控制，不受控制的客流被视为国家安全的威胁，加强边境管控并制定了严格的规章条例。1915年，严格的旅行限制条例被写进《英国领域防卫法案》(The Defense of the Realm Act)。1918年，《一战旅行控制法案》(the World War I Travel Control Act)在美国实施。这些法案的影响一直延续到战后。护照发放、签证机关与海关被赋予酌情裁定权，对于证照申领和入关的文件和程序有着相当严苛的要求和规定，这些规定无形中加重并延长了战时的紧张气氛。

1918年8月，辛亥革命元勋曹亚伯出游欧美，据其《欧战世界旅行记》记载，此次出游的目的地是中立国荷兰，目的是考察实业，重点考察荷兰治水方法，以为中国将来治水患。《旅行记》详细记述了曹亚伯辗转美国、丹麦、德国赴荷兰的经历，详细记述了战时欧美各国之间极其严苛的出入境手续和海关、交通管控及粮食物资的分配状况。他激烈地抨击美国对于中国入境者的不平等对待。临近美国时，检查员直言：“汝辈中国人，吾不能登记，亦不能给汝登岸证券，须俟船抵西雅图时，将汝辈中国人送至移民局，由局长一一检查登记。”中国人中的三等乘客，尤须拘禁于移民局内，等候医生检查身体，如有任何身

体或证照方面的问题，都会被送至海岛拘禁。头等乘客虽可免除此项麻烦，但也不能受到与其他国家来客的同等待遇，需经关税检查所与移民局的严格审核无误后，方可获得“许可入境”。曹亚伯在美国滞留数日后计划乘北欧轮船公司船赴瑞典，但是轮船公司的船期均由美国海关临时命令而定，买票手续也极为繁杂，须先向美国政府移民局提出出境申请，得到美政府许可后再将护照送至各经国驻纽约领事馆签字，之后，再往美国海关检查所盖印、签字，获得“通过战时防御线凭证”后方可购票乘船。因曹亚伯原先的护照目的地是荷兰，现在改往瑞典，原有护照无效，须另外申请护照，才可向美政府申请出境。但是，瑞典虽中立国，大战期间粮食困难与交战国无异，需经瑞典驻纽约领事馆发电报向瑞典外交部询问是否允许外国人入境，曹亚伯未获得入境许可。他只好绕道丹麦，几经周折得到丹麦领事馆签证，但只许停留三日。在纽约港乘船出境时，水兵持枪实弹查验，海关检查员检查行李及身上衣服、囊中钱票。战时美国各机关对于所有有出入境记录之公民实行实时监控，丹麦也一样。船未抵岸前，乘客须填报所有之衣服、鞋帽甚至手中、麻履几条都要交由海关检查。海关收存申报单，出境时对照申报单检查所携物品，单上所填入境时之衣、物如与出境时之衣、物不相符合，则罚以偷运之罪。因战时衣服昂贵，丹麦衣料丰足，为防外国人运出

衣服导致丹麦衣料缺乏，丹麦政府用申报之法，使外国人无从运出一丝一线。在《欧战中世界旅行记》中，曹亚伯非常详细地记录了所经各国海关对于外来旅客的检查程序，但是，他对于战时欧美海关、要隘的严格管控，未有丝毫抱怨和负面批评，反而予以同情的理解，盛赞这些国家行政管理之井然有序，各级政府无论平时战时，皆做应做之事。相比之下，中国海关失控的情形触目惊心，令他愤慨。一年后曹亚伯回国，船抵吴淞口，既无医生船来检查，也无边检人员登船查验行李货单与乘客护照，旅客自由出入，如入无人之境。他不禁为中国人深感羞愤。他认为，任何一个拥有主权的独立国家都应该像欧美列国那样严把自己的国门。

实际上，很久以来，欧美一直在为其国民在异国的自由旅行权利而斗争甚至不惜发动战争。1858年6月，清政府与英法签署的《天津条约》特别强调“外国人可进入中国内地自由传教，游历、经商”。与此同时，欧美列强却时刻严守着自己的国门。就美国与中国而言，自19世纪60、70年代民间与官方对于华人的抵制，80、90年代对于排华法案的制定和补充修订，到1943年排华法案的废除，期间有关华人出入境的一系列条例、细则的修订，以及官方和民间围绕着华人入境的激烈争吵，可以说，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40年代中国人的旅美之行一直是在严格的管控乃至排华的阴影笼罩下进行

